

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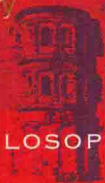
杨耕 主编

M

The Decline of
Metaphysic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 and Feuerbach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形而上学的没落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

吴晓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杨 耕 主编

The Decline of Metaphysic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 and Feuerbach in Contemporary

形而上学的没落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

吴晓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总 序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逝世之后，对他的观点、思想和学说进行持续性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深入而持久的研究却是罕见的。20 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内在价值和当代意义透显出来了。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每当历史处于转折关头，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研究。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趋于“冷寂”乃至衰落。这是一种只见现象、不看本质的观点。在我看来，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冷寂”不是意

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衰落，而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中产生的，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和阐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马克思正在向我们走来，离我们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正因为如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层次愈来愈深，其探讨的问题之宏广邃微，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呈现出璀璨的理论星空，让人驻足，引人思考。正因为如此，我们向读者呈上这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包括：陈先达教授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孙伯鍤教授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高清海教授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教授的《现代唯物主义导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研究》，陈志良教授的《思维的建构和反思：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孙正聿教授的《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俞吾金教授的《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王东教授的《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哲学笔记〉中的列宁构想》，欧阳康教授的《社会认识论导论：探索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之谜》，王南湜教授的《人类活动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丰子义教授的《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张一兵教授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似自然性、物役性批判理论研究》，任平教授的《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视域与当代意义》，张曙光教授的《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追踪》，杨耕教授的《重建中的反思：

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吴晓明教授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韩庆祥教授的《现实逻辑中的人：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研究》，汪信砚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与创新》。作者们的这些代表作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理论内容，体现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而深刻的体认，展示出一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画面。你可以不欣赏这幅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燃起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激情。

这些著作又是作者们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从根本上说，理论上的任何一种重新解读、重新研究乃至重新建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正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促使我们重新解读、重新理解乃至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真正理解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真正理解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与人的活动的选择性的关系，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真正理解了人与人的关系何以转换为物与物的关系，真正理解了“重建个人所有制”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的含义，真正理解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具有“令人震撼的空间感”，仍然以强劲的姿态参与并推进着人类历史进程。在编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死而不亡”。马克思“死而不亡”，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杨耕

2016年3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章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阐释定向 / 10

一、梅林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定向 / 11

二、梅林阐释定向的后果与推论 / 23

三、普列汉诺夫对于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退行性规定 / 42

四、普列汉诺夫对“基础”的补充：辩证法 / 59

五、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哲学阐释的实证主义方向 / 85

第二章 取消费尔巴哈的优先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阐释定向上的
反拨 / 99

一、“基础”阐释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是否具有优先权 / 100

二、卢卡奇对科学实证主义阐释路径的抨击 / 116

三、柯尔施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 135

四、柯尔施的黑格尔主义阐释定向 / 152

五、卢卡奇之重返黑格尔主义的基地 / 173

第三章 费尔巴哈的哲学—神学批判及其变革图谋 / 198

一、何以须得重估费尔巴哈的意义 / 199

二、费尔巴哈对神学的人本学批判	/ 218
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 234
四、费尔巴哈对一般哲学或整个哲学的批判	/ 260
五、费尔巴哈对哲学之范畴论路向的批判	/ 284
第四章 费尔巴哈的主要哲学贡献与理论终局	/ 306
一、感性与超感性世界	/ 309
二、对象性与绝对主体	/ 336
三、现实的人与现实的自然界	/ 360
四、感性直观：费尔巴哈哲学的限度与终局	/ 377
第五章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及其存在论革命	/ 417
一、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与费尔巴哈哲学之必然的和本质的联系	/ 418
二、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的共同之点	/ 444
三、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最初差别及其扩展	/ 473
四、施蒂纳、费尔巴哈与马克思	/ 494
五、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	/ 538
索引	/ 587
参考文献	/ 595
后记	/ 599

导 言

本书的主旨，在于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有所阐说；而这一阐说，试图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更加深入缜密的分析来开展，以期使这一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关联被本质重要地揭示出来。当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现代性(modernity)的框架内并从而被遮暗了。因此，这一问题完全有理由在阐说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视域中被重新提示出来，它尤其应当在马克思哲学已然经历的历史命运以及 20 世纪哲学运动已然获致的经验和教训中被更加深入，也更加切近地提示出来。

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以及二者之间的本质关联，似乎已经是一个非常陈旧的和过时的主题，

而且其间的由诸多关系所形成的问题，也似乎已经完全地并且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们轻易地认为而且相信，这里的一切都已十分妥实，井井有条，这里不再有真正挑战性的问题，实质的困难也已经被解除并且被纳入宽阔平坦的理解轨道了。

毫无疑问，恩格斯为了偿还“一笔信誉债”而于 1888 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原则上正确地规定了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并且大体上恰当地揭示了二者（以及它们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一般关系。但是，由于这本小册子十分简单，而且也由于它具有特殊的权威性，所以其初始的意图——作为提示性的解释方案当引导到更加深入的探究、当开展出更加广阔的理解视域——却反而历史地被延宕或耽搁了。确实，当一些虽然简单但却正确的断言不是被当作深化与拓展的导引，而是被当作教条化的图式或口实时，理解的前景便恰恰不是被具体地构成，相反倒是由于被阻滞而停顿下来了。

诚然，这里所提示出来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理论性质的，也绝不仅限于观念的或思维的方式，毋宁说，它更深刻地植根于现代生活的本质之中。当时代的生活状况仍然在总体上以现代性为原则并以之为枢轴而围绕着它旋转时，上述那种延宕或耽搁的危险性便是始终存在的。因此，真正说来，延宕或耽搁只是一种表面情况，它所意味着的危险性也并不仅仅从属于所谓教条化，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危险性本质地存在于统摄理解的现代定向上——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依现代性原则来为全部理解制定方向的。这种危险性甚至在马克思在世时也是到处潜伏着的，以至于马克思不得不如此激烈地抨击 1875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如此激烈地抨击诸多已然声称以马克思为导师的派别，甚至在一个场合还

如此决绝地声称：“反正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于这种现代定向的危险性如何始终命运般地威胁着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我们在这里只需指出下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够了：正是依照现代性的原则框架，马克思的思想往往不是被理解为知性科学或经验实证科学，就是被理解为某种类似于宗教因素或价值因素的东西，或者，被看作上述两者的混合物——至于混合的“比例”，则可以是或多或少地有所区别的。

与本书主题相关的那个领域，同样经常是以这种方式作为理解定向的，那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亦即费尔巴哈与黑格尔。据说马克思就是兼及这二者，据说他的哲学就是把二者“综合”、“统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在马克思哲学内部的某种费尔巴哈因素就可以用来反驳某种黑格尔因素，正像其内部的某种黑格尔因素又可以用来反驳某种费尔巴哈因素一样。至于这两种因素何者居于优先地位，则仍然可以滞留在激烈的争论中；较为极端的见解偏执于一方而使另一方成为无关紧要的“附加物”（因为这样的附加物很难被完全革除掉），而较为温和的见解则致力于调和出一种混合物——当然，混合的“比例”仍可以是或多或少地有所区别的，仿佛问题就在于一杯水中究竟应当放多少糖并且应当放多少咖啡方才合适一样。

但是这样一来，全部问题便就整个地从属于近代(modern, 也即现代)哲学的基本框架了。因为在上述情况下，无论是马克思哲学的费尔巴哈因素还是黑格尔因素，都已先行地被当作是既有的和现成的东西被固定下来，从而使得整个理解方案完全从属于现代性的支配。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所谓“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依照费尔巴哈来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阐释制定方向时，情形就是如此；而当卢卡奇、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上述正统，并力图指证黑格尔在马克思哲学的阐释

中对于费尔巴哈来说具有优先权时，情形亦复如此。虽说这两者都曾听说过并且也知道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重要的“超越”，而且也曾费尽移山气力尝试就此点加以申说和发挥，但真正说来，恰恰是由于其原则本身的局限性，他们关于此一根本之点或核心之点的意见既非本质，亦不重要，而大多属于缺乏根基的、外在的、迂回曲折的“附加”或“补充”——此等附加或补充之所以缺乏本质的重要性并因而只能被看作偶然的意见，仅仅是由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一事对于他们的理解来说，并没有从哲学的根基处（我们的意思是说，从存在论的根基处）得到真正的和切近的把握，并没有令整个理解由此一根基处内在巩固地建立起来。

因此，问题的要害恰恰就在于：上述对马克思哲学之根本的和总体的理解，就基本性质而言——不是就表面的、枝节的表述而言，而是就其根基的性质、就其本质而言，归根结底被局限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进而言之，由于费尔巴哈哲学的终局乃归之于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支脉”，所以问题可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被简化为这种理解对于黑格尔基地的从属关系或依赖关系。但是，在这里，从根本上来说，理解之从属于或依赖于黑格尔的基地又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说：这样的理解从属于或依赖于整个近代哲学的基本框架——因为黑格尔是近代哲学的完成者；不唯如此，它的意思还表示：这样的理解从属于或依赖于整个形而上学的主导原则——因为黑格尔又是西方形而上学（所谓“柏拉图主义”）的完成者。不难看出，在这样的意义上，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便代表着一般形而上学——不只是近代理性形而上学，而且是整个哲学形而上学传统；同样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黑格尔哲学便不是形而上学之一种，

而是形而上学之一切。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它在哲学上所完成的革命的意义，正是在终结全部形而上学的那一度上方才真正显现出来。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如果它毕竟还能在某种意义上被称之为“哲学”的话），根本不止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更加重要的是，这一断言本身还必须不止于作为“口头装饰品”的东西；因为要仅仅做出这样的断言——马克思哲学不止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太容易了，它是如此地平常和容易，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赞同并且声称同意这一点的。但是，唯有当我们真正切近地（亦即在理论上内在巩固地）把握住马克思同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以及同整个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的脱离**，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以及这种当代性由以伸张的机杼方才有可能同我们真正照面。为了使得本书后面的讨论变得较为简明易行，我们可以在这里将上述所谓“批判的脱离”从原则尺度上提示为这样三个方面：（1）从“**理论态度**”的立场中彻底摆脱出来；（2）终止全部哲学—形而上学驻足其间的**知识论路向**（或**范畴论路向**），并揭破这一路向的全部**天真性**；（3）洞穿并全面瓦解——由存在论的根基处洞穿和瓦解——“**意识的内在性**”。

然而，就总体而言，这样三个实为一体的方面，无论是对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来说，还是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来说，都几乎还停留于晦暗之中。在这里，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对于理论态度、形而上学的知识论路向以及意识的内在性等局限性完全懵懂、一无所知；我们的意思也不是说，他们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中仅只是误入歧途、一无是处；我们的意思恰恰是要表明，虽说他们对问题的某些方面有所领会，并且做出过某些相当有益的贡献，虽说他们

不必为历史形成的遮蔽承担全部责任，但是，他们的局限性却有理由作为经验或教训来构成进一步探索的路标。另外，就理论本身而言，正是由于形而上学的理论态度、知识论路向以及意识的内在性未曾从总体上得到真正的批判，未曾由存在论的根基处遭到彻底的清算和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无论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定向从根本性质上来说，都不得不滞留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基地上；并且由于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理由，他们实质上不得不滞留于黑格尔哲学或黑格尔哲学的某一片断的基地上。而这恰好同时就意味着，如此这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和理解，归根结底乃是依循形而上学传统，特别是依循近代理性形而上学来制定方向的。

恰恰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本质意义——一言以蔽之，它颠覆并终结全部形而上学，以及经由此一革命而获致的全部当代性质，就变得蔽而不明了。不唯如此，由于黑格尔哲学已然作为一般形而上学而臻于完成，所以这一立场真正说来乃不容滞留：或者是由此引导一个全面的突破而开启崭新的路径，或者是在此徘徊踟躅而实际遁入一条衰变退化的轨道。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依循费尔巴哈来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阐释制定方向时，他们对于唯物主义的实际理解是如此迅速地倒退到康德以前，以致他们不得不在这种前康德的立场周围外在地附加各式各样的“补充”，而这样的补充真正说来乃是无济于事的。同样，当卢卡奇引领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而袭击“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之际，他为了克服其前辈的那种科学实证主义的无为主义而诉诸黑格尔的总体性，但他在此一框架中对于“阶级意识”的阐说发挥，从根本上来说却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费希特主义的行动主义。这样一种态势本身是意味

深长的；它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在现代性质的理解和阐释中从根基处发生了“爆裂”：当它的一端落入未经先验哲学洗礼的前康德的唯物主义，并且最终只能在斯宾诺莎的“实体”中站住脚跟之时，它的另一端却飞向了德国唯心论有以开启的主观主义，并且实际上不得不在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中措其手足。任何试图从外部对这两端进行调停、联络和补缀的努力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徒劳的，因为这样的调停、联络和补缀已经先期地肯定了基础的支离破碎，而我们知道，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却根本不是支离破碎的。那么，从内部进行的同样的努力是否能够成功呢？诚然，它曾经成功过的——那就是黑格尔哲学；而我们同样知道，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根本不是黑格尔性质的，毋宁说，这一基础的建构开始于指证黑格尔的成功已然面临的历史性失败。

因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提出阐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一任务，而且，由于 20 世纪的理论历程所导致的问题提法的改变，这一任务势必要求深入到哲学之更为根本的问题域中，要求由存在论 (ontology) 的根基处做起。如是，则经由费尔巴哈哲学的重新阐述——经由这一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关系的更加精详绵密的检审和考究——来达于主题的路径就会是恰当的、赋有特征的和具有提示作用的。这不仅是因为费尔巴哈哲学在时间顺序上介于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不仅是因为费尔巴哈第一个本质重要地由存在论方面富有成果地攻击了黑格尔，也不仅是因为费尔巴哈颇为深入地把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理解为对一般哲学——其本质即是宗教神学——的批判，而且还因为他的颠覆图谋的悲剧性的失败，因为他的前行努力之命运般地向回折返。这样的失败和折返所导致的形而上学复辟在这里是更加意味深长的：一方面，它

在本质上预演了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失败和折返的教训，就此我们可以举出这样一些名字：施蒂纳、孔德、克尔恺郭尔，甚至还包括尼采；另一方面，它从根本上，亦即从存在论的根基上提示出中止上述失败和折返的边界条件，提示出马克思哲学之终结全部形而上学——如果它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的真正出发点和立脚点。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的这样一种探讨和研究，虽然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返回到过去的步骤，似乎是再度沉浸到 19 世纪 40 年代以及稍稍往后的题材中去，但这里的问题本身却是当代性质的，是经由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它的得与失、它的成绩与挫折、它的经验和教训——而提示出来的。因此，我们重申自己的目标在于通过这一回顾由存在论的根基处阐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而这样的当代意义不能不由未来的指向来调节、来安置，来获得其本质的内容。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直接意味着一种从根基上向着未来的筹划。就此而言，我们完全赞同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1993 年)一书中的下述说法：

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没有这种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①

^①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21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或许有人会觉得，一种现实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向着未来的筹划似乎根本无关乎什么哲学、什么存在论根基之类的东西，似乎恰好是在放弃更加深入的追问与探究、放弃更加切近地思入存在一事的时候，现实的和实践的任务方才开始能够被提出来。然而，这样的想法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在经过了20世纪的历史——无论是实际生活的历史还是哲学运动的历史——之后尤其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观点纯全立足于现代性形而上学原则下的理论与实践的狭隘关系，以及同样原则下的思维与存在的狭隘关系；因为在这样一种狭隘关系中，理论与实践、思想与存在的任何一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为形而上学的本质所贯穿、所霸占，并因而在其彼此的对待中就不能不是纯粹抽象的。如果说，20世纪的哲学历事毕竟给出了它的经验和教训，如果说这样的经验和教训首先意味着上述狭隘关系的立场已变得陈腐，已成为历史的过错，那么，在这里可能提出的任务根本就不是拒斥或放弃思，而是更加深入也更加切近地去思——因为正是这样的思方始把先前的经验和教训作为经验和教训来加以吸收，方始在这一吸收过程中脱开其被形而上学长久霸占的本质，并因而方始在此一脱开之际整个地沉浸于存在世界并直接意味着开启行动。一句话，当我们提出问题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当我们试图追究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并试图由存在论的根基处来实施这一追究时，这样的问题和追究恰恰应当是由当下的历史引领着前来同我们照面的——它们归根结底是依据时代的基本性质而被课题化的。